



专科化时代的通才

——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

朱潇潇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专科化时代的通才

——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

朱潇潇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朱潇潇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309-08418-4

I. 专… II. 朱… III. 张荫麟(1905~1942)-人物研究 IV. K825.8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6616 号

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年代的张荫麟

朱潇潇 著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31 千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418-4/K·350
定价: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张荫麟是 20 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天才式的史学家,国学根基深厚,同时又接受了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治学路径和史学理念。张荫麟的个人成长,又与中国现代历史学科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同镜面的内与外,对两者关系的深入探究,可以作为研究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转型的一个由点及面的代表性范例。

初步萌生这个想法,是在我硕士研究生学习开始的时候。在经历复旦历史系本科的基础教育后,兴趣逐步集中到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嬗变上。在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我有意将这一兴趣进一步收窄并细化到中国现代历史学科的建立及其规范的建树过程中,将 3 年所思和所得撰写成博士论文《专科化时代的通才——1920—1940 年代的张荫麟》,本书即在此文的基础上补充了两年多来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以及对原有观点的深入思考和修订。

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史学在汲取了西方学科的养料后,在学术体制的成型、表达空间的架构以及史学思想的成熟等多重维度上出现了崭新的景象。尤其是五四后的 20—40 年代,成为史学转型的高峰。这一时期内,不仅学术成果迭出,更重要的是凭借学科的转型,一批熟谙中西史学理论、接受了现代史学学术规训的史学

家群体已经出现。他们是史学转型的承受者和当仁不让的推动者,史学家张荫麟即是其中的代表。

之所以选择张荫麟作为透射这一时代变化的人物,是因为张的出身、经历以及他对历史学科所作出的探索和思考,使其在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序列中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留下了短暂却又光耀久长的痕迹,直到今日仍不断有“新鲜”的资料为研究者发现并公之于世。

作为映照两者关系最集中的段落,本书以张荫麟从20—40年代这20年间主要的学术活动为线索,来求证这一体制化的史学学科规训逐步建立的过程。因此,作为张氏求学和任教的主要场所——清华、他所参与的各类刊物以及围绕他的著述进行的关于历史哲学的思辨,就成为考察的具体对象。而在大量的细节中,笔者也将从张荫麟的学术交往和活动出发,注重对这一学术网络的群体描述和观念厘清。

全书共分为四个主要部分。第一章以张荫麟的清华经历为明线,历经求学、求职与任教等不同阶段,考察清华历史系从模糊的国文意识中独立到现代学科体制建立的过程;第二章以张荫麟学术活动密集的《清华周刊》、《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公报·史地周刊》、《思想与时代》等刊物为线索,探讨史学转型过程中学人通过刊物所构建的学术网络以及在学术发表过程中对学科化过程的接受及反思;第三章以张荫麟的学术著述为源,将其关于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思考的观点变化,作为透射当时史学前沿问题的具体视角;第四章则是以张荫麟的代表作《中国史纲》为研究对象,纵向以通史撰写在这20年间的流变为参照,横向以钱穆的《国史大纲》和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等作比对,从史学与世

变的互动中反映史学转型中“求真”与“致用”意识交织的现实局面。

在撰写及修订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这一选题还有有待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比如对彼时中国通史撰写热潮的分析等等。随着历史学及其他学科工具的发展,我相信对于张荫麟以及中国史学转型的研究一定会有视角更新颖、分析更有力的论著出现。

是为序。

朱潇潇

2011年6月

目 录

绪论	1
一、问题缘起及概念界定	1
二、研究状况	5
三、研究路径与资料状况	17
四、研究框架	21
第一章 制度转型下的个人范本：张荫麟与清华	24
第一节 学校教育与社会引导的交织	25
一、“整理国故”影响下的国文教育改革	26
二、大师的引入：梁启超与张荫麟的学术渊源	32
三、清华历史系与分科意识之始	42
第二节 清华历史系：学科化建设进行时	51
一、归治于教育部与罗家伦的改革	52
二、蒋廷黻新政之一：课程改革“中西兼通”	55
三、蒋廷黻新政之二：新型学者及教师群体的 建构	64
第三节 妥协与分歧：专科规范化时代的个人史	75
一、一波三折的入职与升迁	76
二、清华对教师的专业化需求与张荫麟的妥协	82
三、专业学会的建立：自下而上的学科化呼应	92

第二章 学术专业刊物：以张荫麟与 20—40 年代报刊

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96
第一节 学缘、地缘关系主导下的学术起步	98
一、学缘建构：张荫麟与《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的 书报介绍	98
二、《燕京学报》与张荫麟学术联系的地缘解读	108
第二节 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	113
一、“学衡余孽”还是《文学副刊》先锋？	114
二、《大公报·文学副刊》：学术批评的公共空间	119
三、辩中求道：张荫麟在《文学副刊》上的学术批评	126
第三节 学科聚合的形成：边界的清晰化	131
一、《世界思潮》：与哲学家群体的对话	132
二、史学专科化的内部表征——社会经济方法影响下的 史学研究会	137
三、张荫麟与《大公报·史地周刊》	145
第四节 危难时代的跨学科思想	155
一、其刊其人：跨学科的萌芽	156
二、张荫麟主编时期的编辑与撰文	160
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选择背后	165

第三章 史学学科化的内在之维(上)：科学之真，

还是艺术之真？	169
第一节 理想史学之实现，须赖理想史料之养成	173
一、科学疑古的理论化倾向	173
二、张荫麟史料观的分析	177

三、如何造就理想的史料	181
四、默证之争：新史学的逻辑学洗礼	183
第二节 循环论的循环？	187
一、史观溯源	187
二、五种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	189
第三节 科学、艺术的纲目之辨	196
一、科学，成为历史学的上帝	197
二、张荫麟：直觉与价值共同作用下的史学艺术性	200
第四章 史学学科化的内在之维（下）：“致用”的史学与	
通史写作	209
第一节 危机·通史·《中国史纲》	211
一、危机的理论分析	211
二、《中国史纲》编写肇始	216
第二节 对读：理想通史的标准	221
一、《中国史纲》与《国史大纲》	222
二、《中国史纲》与《中国通史纲要》	228
三、“夏商周”样本的三分法	234
第三节 通史编撰的哲学思考	238
一、时间问题	238
二、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	240
三、真历史与编年史	242
结语 张荫麟：走向乌托邦的征途	245
一、一场有意为之的中西对话	245
二、史学家张荫麟：影像的叠合	249

三、另一场讨论：关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251
附录：张荫麟报刊文章发表目录	254
参考文献	267
后记	287

绪 论

一、问题缘起及概念界定

20 世纪中国学术在西潮冲击的背景下,有一个重新分类的分化组合过程。^① 原本以博通为诉求、并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知识架构的传统学术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学术分科的规训,以大学及各研究机构的转变、专业报刊及各类学会的出现为表征,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学科开始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并以此展开了与传统学术的分途。但在此过程中,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传统学术却并没有如学科变化主导者们所设想的那样逐渐隐退,反而展露出新的生命力,如在 30 年代面临普遍的民族危机的时刻,传统史学中的“致用”功能却成为所有曾以“求真”为第一要务的历史学家所欲凸显的主题;因此,学科专业化与学术传统的交织与冲击便成为所有相关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共同背景。

在姜义华、武克全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中,将中国史学的这一重要百年分为大致的四个阶段,除了关注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与成长的线索外,还将从 20 世纪初到 40 年代所发生的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以及现代史学的多元

^① 罗志田认为这种学术的分化组合在一定程度上仍在进行中,参见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编序”,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页 5—6。

成长作为叙述的重点,并且专门辟出章节(第二编)描述史学专科化后各分支领域的成形与发展,将其作为现代史学最为重要的特征。^①然而,专科化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推行的背后,本身是这种带欧洲中心视点的社会科学学科范式更大规模地在世界各地扩散,成为欠发达国家的学术体制的正规模式的过程。因此,专科化因其背后蕴含的西方化而在世界局势已经走向多元化之时的今日受到众多学者的质疑和诟病。^②除去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反思外,跨学科与学科融合也成为对专科化的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呼声。^③

而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历程中,这种学科化尤其与现代化乃至民族主义所声言的民族复兴的愿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值得今日的研究者从更多的视角和以更多的研究工具来复原其本身的错综关系。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史学界学科发展萌芽及加速发展的集中时期,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与其他学科一样,经历了现代与传统话语的纷争与融合,中学对西学的抗击与妥协等多方面内容,以今日观之,影响后日中国史学取向的多次历史事件,也基本都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此起彼伏,“整理国故运动”,“古史辨”运动,“社会史大论战”等,这也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科在积极吸收西方学术方法和走向自觉、自醒式的发展道路上的一道分水岭。

尽管在史学史领域一般将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作为

① 参见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3。

② “专题导论:从学科改革到知识的政治”(编译者),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页3。

③ 王晴佳在考察近20多年来的史学发展趋向时,注意到中国史家对跨学科方法的兴趣和提倡,并指出“1980年代以来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深化了史学跨学科的趋势,扩大了史学的领域和史学家的视野”。参见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册,页711—712。

近代中国“史界革命”的逻辑起点^①，以“新史学”将这几十年的变化一言以蔽之。但是，正如王汎森所指出的，晚清民初围绕《新史学》引发的中国究竟是“有史”还是“无史”的争论只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开端，它促发了全新的历史意识并重新厘定什么是历史。^②在此基础之上，史学随着近代学术独立的潮流以及客观原则的要求，真正走上“学院化、专业化与独立化”的现代发展形态，则主要是在五四以后。^③从2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成熟期，历史学科的存在和重要性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以传统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如北京、南京等一批最早的大学生建立为契机，符合现代学科化要求的新兴史学家群体也开始萌芽成形；专业刊物的出现和快速发展同样也成为史学专科化的标志和催化剂，因为这也意味着学科化形成中必不可少的公共学术空间的生成。当然，对历史系科发展最重要的影响还是来自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新变化——逻辑工具的使用和历史哲学的关照成为这一批新型史学家们思维特征的重要标识。可以说正是在五四以后，1920—1940年代是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大致确立的时段，多维

① 当然，中国的“新史学”是否由梁启超首先引入，并且他是否是具有这种全新历史意识的第一人，学界向来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新史学》中的诸多论点大多来自日本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之说（参见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而实际上，20世纪初年中国学界的许多人都已经开始注意介绍日本学者著译的新的历史书籍（参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思潮初考》，《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3期），并在新式学堂引入日本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参见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比如瓦格纳教授就认为王国维（代罗振玉）于1899年为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所撰写的序已经标志着这种全新历史意识的产生（参见Wagner, “Importing a ‘New History’ for the New Nation: China 1899”, in Glen Most ed., *Historization — Historisierung, Aporemata, Kritische Studien zur Philologiegeschichte*, vol. 5,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1）。

②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165—167。

③ 参见汪荣祖：《五四与民国史学之发展》，收入萧延中、朱艺编：《启蒙的价值与局限——台湾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183—195。

度、多向性是这一时段现代史学的发展形态。

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推动者和承担者的历史学家们,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施动者和受动者的角色呢?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们是如何制造并且认同现代学科中的“规训”呢?在他们背后,中西方的史学研究思想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对接、冲突、妥协乃至交融,共同构成中国历史学科发展的真实生态?对于这一过程,此前的研究多以史学家的个人传记或者是思潮、学派的勾勒进行过侧面的表达,而以明确的学科化进程为背景叙事,将史学家在这一过程中的经历作为论域空间进行整体考察的文章并不多见,这也成为推动着我在这几年的时间通过搜寻史料、广泛阅读以求不断丰富这一想法并写成此文的初始原因,希望选择一位史学家,来展示我国现代历史学科的建立,以及学科规训对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

张荫麟,以其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的多元,成为映照这一复杂进程的良好载体。他是我从硕士阶段就开始接触的历史学家,其生平从清华开始,经历了求学、留学、回国留校任教,然后进入国防设计委员会撰写中小学历史教材,再回清华,转入浙大等阶段,完成了那一时代典型知识分子的特征——幼习经史、入新式学堂、负笈出游,在吸收东西方学术思想同时又对两者的利弊有着清醒的认知。张荫麟在进入清华的时候,即已开始萌发研究史学的意愿;在顺利获得留学资格,进入斯坦福大学之后,他已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加强其他学科来为已进入专业化之途的历史研究做必要的补充,最后,张在美国获得的是哲学硕士学位;张荫麟最早的系统性专科学术贡献即是开创了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新领域,而他最为后人关注的学术成就,则是其在《中国史纲》的写作中彻底贯彻了自己“撰著”之史的方针,即将史料的甄选、“斧削”之真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比兴”之美相结合,创造了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的范例。

另一方面,张荫麟在这段时期内作为史学专科化范本的研究

意义,还在于其与不同时代多个史学家群体的密切关系。从这一点来说,将张荫麟作为学人群研究中起串接作用的有机分子,同时以中国史学的学科化构建作为分析背景,对他在 20—40 年代学术活动的解读,无疑就具备了剖析学科化时代史学家群体共同意识的含义。在具体的个案分析中,其一,张荫麟是“新史学”发展源流中一位重要代表,被许冠三视为梁启超“学术志业的继承人”。其二,他在二三十年代的史学界,学术足迹遍及当时主要的史学潮流和重要问题(如“整理国故”运动、“古史辨”运动、社会经济史研究、民族主义史学与历史教育等);其学术交往圈涉及了众多史学名家和各类形式聚合的学术团体(包括清华师友圈,吴宓的《学衡》群体,容庚、陈垣等东莞学人,顾颉刚等《燕京学报》、《史地周刊》同人,张其昀、钱穆等《思想与时代》群体);其三,他本人通过大量的史学批评、通史实践以及历史哲学的反思类文章,与当时的多位历史学家及哲学家保持着频繁的笔墨往来。

因此,要给本书定性的话,那么它就是以张荫麟作为叙述的中心和贯穿的主线,围绕他的学术经历和史学思想,以及他同学术圈的互动,来探讨 20—40 年代的史学界和史学转型整体视域下的历史学家“微观”局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既是为张荫麟本人所撰写的学术传记,同时也是结合个体人物所进行的学科史、史学史研究。

二、研究状况

1. 关于史学转型的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所发生的由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嬗变,是一场“脱胎换骨式的改造”,身历其中的学者都有着对变化的深刻体认。在 1940 年代前后,也就是现代史学已逐步成形的时期。一批史学家纷纷撰文对中国史学近三十年、近五十年乃至近百年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分类、回顾与评述。其中较值得注意的几篇论著有:金毓黻的《吾国最近史学之趋势》(1939 年初刊,后收入于

1944年版的《中国史学史》附录中)、周予同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顾颉刚的专著《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基本上是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所提出的“史学史的做法”写成的,除了关注史官、史家、史学之成立及发展外,也按照梁氏的条目加入了“最近史学之趋势”^①,这可以说是较早对现代史学发展进行概括的重要著作。金毓黻认为就史学的发展来看,“清季怵于外患,学者转而骛新,民国以还尤甚”,这种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甲骨文、敦煌卷子以及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出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另一则是在梁启超、何炳松等提倡下新的通史与专史之编纂,由于篇幅局限,所以叙述较为简略。^②

在撰写时代稍晚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中,一直以来为史家所引述和争论的,就是其对新史学诸派系的划分。按照周予同的看法,史学家们被分为史观与史料两派,而史观派具体而微被分成“经典派”和“超经典派”。其中,“超经典派”更是以左、中、右的姿态被区隔为释古、考古、疑古三个派别。^③虽然周予同这一分类的执行原则已遭现代学者的质疑^④,但是这种分法却对今日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论史学家们是否同意这一派分,仅从今日史学史研究的具体表现看,基本上还是没有脱离周予同当年划定的语境。尤其是在史学史论著中,仍坚持用史料派和史观派

①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版“导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1—3。

② 参见“最近史学之趋势”,金毓黻:《中国史学史》。

③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页520—522。

④ 如桑兵就认为“与其他学人的划分相比,周予同的分法也有些怪异”,并且反对用条理太过明确派分法看待学术史,参见桑兵、关晓红主编:《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总论“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道统与派分”,三联书店2007年版,页26—28。

的消长沉浮作为整个 20 世纪中国史学变动的基本叙事线索。^①

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最初刊于 1947 年，时代已较金著与周著为后，在对史学学科的整体认识及思考方面，也较前两人的著作更为深入，且回溯的时代更远。其书叙述以《南京条约》签订前后及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为起点，到 1945 年为止 100 年间历史学发展历程，并以民国成立为前后期的分界。前期学者都是做的旧史家的工作；真正的转变当自后期起，史料方面随着考古学上的发现以及明清档案的公布，研究方法上随着西洋科学史观的传入以及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中国史学进步明显。尤其是顾颉刚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是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才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②。这是顾颉刚从史学界内部出发对当时历史学发展所做的描述和概括，其论著中所涉及的观点，也已超越了传统上以史料与史观问题为主的范畴。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著述。与顾颉刚的时间起止点类似，齐文的论述也是从道光年间的史学转变到后来新史学思想的输入为止。齐的重要观点之一是他不认为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史学”就是中国现代史学的起点，梁的观点“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翻成的教科书，与当时风行一时的威尔斯《世界史纲》等书。这都是些通俗读物，并不能代表近世西洋史学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趋势”；“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做起”。齐更认为，代表学科建立的重要标志之

①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②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页 3。